

三星堆文化研究四十年

许丹阳

提 要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三星堆文化研究已历四十年。本文从器用、居址、墓葬、工艺与信仰五个方面概述了三星堆文化的基本特征,并从年代关系、文化分布范围、陶器群演变序列、文化特征四个方面综述了三星堆文化的来源和去向。三星堆文化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周边地区文化因素,并加以融合、改造而形成的复合型文化。它是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发展的高峰,也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三星堆文化 文化特征 文化源流

中图分类号: K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247(2021)02-0051-12
DOI: 10.15990/j.cnki.cn11-3306/g2.2021.02.006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Sanxingdui Culture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Xu Danyang

Abstract: The study of Sanxingdui culture has lasted for 40 years since the 1980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anxingdui culture from the aspects of utensils, dwelling sites, tombs, crafts and beliefs, and summarizes the origin and direction of Sanxingdui culture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age relationship, cultural distribution range, pottery group evolution sequence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Sanxingdui culture is a compound culture formed on the basis of Baodun culture, and absorbs the cultural factors of surrounding areas by fusing and transforming them. It is the peak of the development of bronze civiliz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and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bronz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Sanxingdui cultur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origin and development

今年 3 月 20 日,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六个器物坑阶段性发掘成果公布,新出土一大批包括金面具、金鸟形饰、青铜大面具、青铜顶尊跪坐人像、青铜方尊、玉琮、玉凿、丝绸痕迹等在内的重要遗物,大大丰富了三星堆文化的内涵,引起社会公众和专家学者的强烈反响。^①

^① 本文所提及的三星堆三至八号坑发掘新成果,仅限于 2021 年 3 月 20 日至 23 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场直播所展示的内容。

三星堆文化是以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为典型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1934年,原华西大学的葛维汉(David C. Graham)教授和林名钧先生等人开启了三星堆遗址的首次发掘。^①而后郑德坤先生在其专著《四川古代文化史》中设专章论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遗物,并首次提出了“广汉文化”的命名。^②1956年秋,为配合宝成铁路和川陕公路的修扩建,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沿线的三星堆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③并指出它们是四川地区相当于殷周时期的文化。195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再次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调查,初步明确其为蜀文化遗址。^④为进一步了解遗址的内涵和堆积情况,196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和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对月亮湾地点进行了正式的发掘,并将所获遗物命名为月亮湾文化,但发掘资料迟迟未公布,学界对其文化内涵不甚清楚。

随着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学说”的提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和广汉市文物管理所自1980年起在因砖厂取土破坏严重的三星堆地点连续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依据新的收获,发掘者将遗址定名为“三星堆遗址”,正式提出了“三星堆文化”的命名,^⑤并得到广泛认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四川盆地青铜时代考古发掘工作的全面展开,已有不少学者从多个角度对三星堆文化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主要从三星堆文化的基本特征、来源及去向等几个方面做一简单梳理。

一 三星堆文化的基本特征

三星堆文化的基本特征主要是依据对三星堆遗址发掘材料的认识而明晰起来的。80年代末期,三星堆遗址发掘者将1980至1981年在三星堆地点Ⅲ区的发掘材料分为三期,并概括其文化特征为:主要生产工具是小型磨制石器,以斧、镑、凿、纺轮数量最多;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器型主要是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把勺,纹饰绝大多数为绳纹;建筑遗迹均属地面木构建筑。同时发掘者指出,在1982年三星堆Ⅰ区又发现了晚于1980—1981年三星堆Ⅲ区最晚期的堆积。^⑥而后陈显丹先生综合1980—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掘材料,对三星堆遗址的分期作了专门的讨论,明确提出三星堆遗址发展

① David C. Graham,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6 (1933—1934), pp. 114—131; 林名钧:《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3年。

② 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本书于1946年由华西大学首次出版。

③ 王家祐、江甸潮:《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由于缺乏对遗址整体的把握,当时该文将遗址的南、北两部分分别命名为“三星堆遗址”和“横梁子遗址”。

④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调查简报》,《文物》1961年第11期。

⑤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⑥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演变四期说。^① 孙华先生依据三星堆陶器在发展演变历程中各期之间变异程度的不同,将第二、三期合并为一期,从而把三星堆遗址划分为三期六段,指出三星堆遗址这三期遗存的文化内涵既有联系、又有相当大的差别,实际上应当视为同一文化系统下的三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并首次将之分别归属为边堆山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② 这是目前学界关于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文化构成情况的主要观点,此后学者的不同观点基本上限于三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如关于遗址第一期遗存所属考古学文化有边堆山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等,关于遗址第四期有属十二桥文化、三星堆文化、三星堆四期文化等意见。

将三星堆文化从三星堆遗址中分辨出来以后,就可以进一步认识三星堆文化的发展进程了,这方面的工作以孙华先生的论述最具代表性。^③ 通过对三星堆遗址和位于重庆万州区中坝子遗址的分期,以此为主线,串联其他遗址的材料,孙华将三星堆文化总体发展演变进程划分为四期,陶器特征表现为:第一期陶器以夹砂陶为主(约70%),但泥质陶数量还相当多;陶色以褐色为主,其次为橙黄色;器表虽以素面为主,但有纹饰的陶器还较多(20%);典型器类有侈口深腹盆、花边鼓腹瓮、浅平盘高柄豆、短颈长腹瓶等。第二期泥质陶比例下降,夹砂陶比例更大(近80%);陶色仍以褐色为主,次为橙黄陶;素面陶器比例有所增加,有纹饰的陶器比例下降;新出现喇叭口凸肩壶、深腹杯形盘高柄豆、细长颈瓶、凸肩小平底壶等。第三期夹砂陶进一步增多(在80%以上),泥质陶进一步减少;陶色仍以褐陶为主,并有增多的趋势;陶器纹饰很少,以绳纹为主;基本沿袭上期的陶器种类,但前两期的壁外卷的平底盘似乎已经不见,大圈足盘也很少发现。第四期新出现了尖底盏等尖底陶器,筒形器座也极具特色;前一期的袋足鬲、带檐鬲形器、大圈足盘等已经几乎不见。现在看来,这个分期结果仍是大体无误的。

此外,李伯谦、^④陈德安、^⑤王毅、^⑥张擎、江章华、^⑦施劲松、^⑧万娇^⑨等先生也相继对三星堆文化的分布范围、分期与年代、文化特征、来龙去脉等基本问题作了研究。而1986年发现的一、二号器物坑无疑是三星堆遗址最为重大的发现,^⑩引起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

①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南方民族考古》第2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第213—231页。

② 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后收入氏著《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9—67页。

③ 孙华:《试论三星堆文化》,《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第138—178页。

④ 李伯谦:《对三星堆文化若干问题的认识》,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三),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84—94页。

⑤ 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

⑥ 王毅、张擎:《三星堆文化研究》,《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王毅、张擎:《三星堆文化研究》,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研究》(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24—236页。

⑦ 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成都考古研究》(一),第63—87页。

⑧ 施劲松:《三星堆文化的再思考》,《四川文物》2017年第4期;施劲松:《论三星堆—金沙文化》,《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5期。

⑨ 万娇:《从三星堆遗址看成都平原文明进程》,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年。

⑩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对其进行解析。^①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将三星堆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器用

1. 陶器

三星堆文化陶器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器两大类。生产工具有纺轮、网坠等,数量不多。生活用器的陶质以夹砂陶为主,比例超过80%,泥质陶很少,其中夹砂褐陶是最主要的陶系,几乎占陶器总数的一半。陶器大多为素面,纹饰不发达,所见种类以绳纹为主,次为弦纹、网纹、划纹、篛纹等,大多数纹饰都施于器物的特定部位。器类总体以小平底器和高柄器为主,包括小平底罐、细高柄豆、高柄豆形器、瘦体壶、束颈瓶、觚形杯、袋足封口盃、带檐鬲形器、鸟头把勺、圈顶器盖等。

2. 青铜器

三星堆文化青铜器种类繁多,主要包括常见于中原地区以及长江流域的铜容器和罕见于中原地区的铜像设两大部分。铜容器有尊、罍、壶、甗、盘等类别,以尊和罍最为常见。铜尊不仅有独立的个体,还见于组合器中,根据孙华先生的复原研究,二号坑出土的“铜神坛”实际上是下面有兽和人两层座子的尊形器,^②同坑还出土一件小型顶尊跪坐铜人像,与三号坑露头的大型顶尊跪坐人像在造型上相似,反映了铜尊在三星堆铜容器中的中心礼器地位。相对于中原系青铜尊,三星堆青铜尊整体显得瘦高,尊口内缘比唇部低而形成盘口,颈部较直并往往施加三道凸弦纹,肩部多立鸟、牛首、羊首等繁缛的装饰,扉棱多作卷云或立羽状,圈足均较高且壁面外鼓弧度较大。铜罍均身体瘦高,腹壁垂直,四个兽首贴在肩下腹壁上。

三星堆文化的铜像设是中国迄今发现的种类最丰富、体态最高大、年代最悠久的青铜群像,也是三星堆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最引人注目的一群器物。孙华先生将一、二号坑出土的铜像设分为人物形象(包括人形神像)、动物形象(包括虚幻动物)、植物形象和组合形象四类。^③人物形铜像在铜像设中比例最大,既有全身的立像和半身像,也有头像、面像,还有大量眼睛和眼珠;动物形铜像数量也不少,种类有龙、蛇、鸟、虎的形象及兽面像等;植物形铜像见有大型神树、小型神树和一些花朵、树叶等;组合铜像则以“铜神坛”为代表。在新的发掘资料发表前,这个分类结果还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被称为“三星堆人”的铜人像,头部造型都非常程式化,三段式长脸,阔眉巨眼,宽扁的嘴角上翘,略带神秘的微笑,身躯瘦长,双手粗巨,是三星堆最为核心的器类。

3. 金器

^① 代表性著作有:孙华:《关于三星堆器物坑的若干问题》,原刊《四川文物》1993年第4、5期,后收入《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第181—202页;孙华:《三星堆器物坑文物丛考》,《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第239—262页;李先登:《广汉三星堆器物坑之再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4年第2期;施劲松:《三星堆器物坑的再审视》,《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赵殿增:《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孙华:《再论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和性质》,西安半坡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编:《史前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84—397页;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问题——埋藏年代、性质、主人和背景》,《南方民族考古》第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53页。

^② 孙华:《三星堆“铜神坛”的复原》,《文物》2010年第1期。

^③ 孙华:《试论三星堆文化》,《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第168页。

三星堆文化的金器主要见于一、二号器物坑,共发现 65 件(片),包括金杖皮、金面罩、金箔饰等。金杖皮由纯金皮包卷而成,上饰人头和鱼、鸟图案。金面罩与铜头像面部特征一致,可能本身就是贴附在铜头像上的。金箔饰数量较多,种类丰富,见有四叉形器、璋形饰、鱼形饰、圆形饰、带状饰等,多为其他器物的构件或装饰。此外,最近新闻报道中提到五号坑出土有金面具、鸟形金箔饰、圆形金箔饰等金器,其中金面具为三星堆首次发现,造型特征与已知的铜面具大体一致。

4. 玉石器

三星堆文化的玉石器种类有礼器、工具、饰件三大类。礼器主要有璋、圭(戈)、璧、琮四类。玉石圭数量较多,形态多样,既有中原地区常见的尖锋圭,也有其他地区少见的歧锋圭、璋形圭。玉石璋造型也很丰富,见有平刃璋、斜刃璋、凹刃璋。从器物坑出土的捧璋小铜人像来看,璋在三星堆文化中相当重要。玉石璧中的有领璧较有特色,琮则很少见。玉石工具一般为通体磨光的小型石器,以斧、镑、凿为代表,此外还有斤、刀、锥、矛和纺轮。其中一些制作精美的斧、凿、斤等玉器,未见明显的使用痕迹,可能并非实用工具,而是具有礼仪性质的礼器。玉石饰件主要是玉石珠。

(二) 居址

三星堆文化的城址目前仅发现三星堆古城一个。三星堆城址由大城、月亮湾小城(西北小城)、西南小城、仓包包小城(东北小城)构成。^① 城址北依鸭子河,南跨马牧河,被河流分割为南、北两区,大城东、西、南三面城墙迄今还大都保留在地表。城墙“墙体由主城墙(即墙心主体部分)和内侧墙、外侧墙三部分组成。主城墙呈梯形,采用平夯法夯筑,两腰经铲削修整,并用圆木棒横向拍打,表面十分平整、光滑、坚硬……内、外侧城墙多数呈倾斜状斜行夯层,有的地方可以看到分块版筑的情况;有些夯层为堆土垒筑,夯筑方法显得较为随意”。^②

三星堆文化的房址有两类。一是三星堆城址西北青关山地点的大型建筑。^③ 在现存面积约 8000 平方米的第二级台地上发现 3 座基址。其中 F1 为长方形的红烧土基址,西北—东南向,残长 64.6、残宽 15.7 米,杜金鹏先生将之复原为一座上下两层的楼阁式建筑物。^④ 二是普通居住房屋,有方形、长方形和圆形三种形式。^⑤ 长方形的多为带基槽的木骨泥墙房址,通常是先在地面开挖墙体基槽,其内树立木柱,间以小木棍或竹棍作为墙骨,在两侧抹草拌泥成为墙壁。圆形房址一般不挖沟槽,直接在地面上掘柱洞立木搭建,应是一种干栏式建筑。

(三) 墓葬

目前所知的三星堆文化墓葬很少。1980—1981 年在三星堆城址内发掘 4 座墓葬,东

^① 孙华:《三星堆遗址的初步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 15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31—170 页。

^② 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8 年第 2 期。

^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的发掘》,《四川文物》2020 年第 5 期。

^④ 杜金鹏:《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初探》,《四川文物》2020 年第 5 期。

^⑤ 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8 年第 2 期。

北向,无葬具和随葬品。^①成都平原上其它遗址被认为属于三星堆文化的零散墓葬有2010年在新都朱王村发掘的4座墓,^②2008年在郫县广福村发掘的5座墓^③等。此外,重庆万州区中坝子遗址1997—1999年发掘的墓葬中也有2座属于三星堆文化。^④而1963年在月亮湾地点发掘的6座墓葬^⑤和1998年在仁胜村发掘的29座墓葬,^⑥现在看来都不属于三星堆文化。总体而言,已发现的三星堆文化墓葬均为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穴较浅,死者均仰身直肢,随葬品数量较少。就目前的发现情况来看,还不足以全面把握三星堆文化的葬俗。

(四)工艺

铜器制作工艺方面,三星堆文化的铜器含铅相当普遍且含量普遍偏高、含锡较少且含量很低。^⑦从同一类器物铜、锡、铅的比例不一,彼此变化幅度很大的现象来看,三星堆文化青铜器在冶铸原料配方上的随意性还相当大,铜料配方技术比中原商文化铜器显得落后。铜器的制造主要采用陶范法,其制模、翻范、做芯、合范、浇铸、打磨等技术与商文化大体相同。大件铜器如带座立人像先分段预制,然后再铸接成型。金器制作工艺方面,三星堆金器已经比较成熟地采用捶牒、篆刻、抛光、剪切、镶嵌等工艺。石器制作工艺方面,三星堆石器主要采用打、磨、钻三种工艺。^⑧

(五)信仰

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正是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生活习俗和思想信仰的一批具有特殊性的遗物。整体来说,三星堆文化充满了浓厚的巫术与原始宗教色彩,形成了以“太阳—神鸟—神人—神树”为核心的太阳崇拜、祖先崇拜体系。造型奇异的“太阳形器”被认为是太阳崇拜最直接的物证,而青铜神树上的立鸟也可以与中国远古神话中代表太阳的“金乌”联系起来。凸目尖耳的青铜大面具被认为是古蜀国的祖先神蚕丛的形象,金杖上所表现的鱼鸟图案被认为是古蜀鱼凫氏族的“图腾”,是祖先崇拜的物证。青铜大立人像可能是当时大巫师的形象,青铜跪坐顶尊人像、刻有跪拜人祭山图案的玉璋、象征扶桑和若木的青铜神树,都生动反映了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祭祀场景,而青铜尊、罍等铜礼器和玉璋、玉圭等玉礼器则在祭祀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①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②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都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新都区朱王村遗址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11),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23—174页。

③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郫县广福村李家院子古遗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9),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83—134页。

④ 孙华:《试论三星堆文化》,《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第165页。

⑤ 马继贤:《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310—323页。

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考古》2004年第10期。

⑦ 孙华:《试论三星堆文化》,《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第172—173页。

⑧ 徐诗雨:《三星堆遗址出土石器历时性变化与制作工艺初论》,《四川文物》2021年第1期。

二 三星堆文化的来源

三星堆文化的来源问题,主要集中在它与宝墩文化的关系上。宝墩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末期一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分布区的考古学文化,主要遗址包括广汉三星堆(第一期)、绵阳边堆山、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都古城、温江鱼凫村、崇州双河、崇州紫竹、大邑盐店古城、大邑高山古城等。

江章华等先生将宝墩文化分为四期,^①陶器特征为:第一期泥质陶多于夹砂陶,泥质陶以灰白、灰黄陶为主,夹砂陶以灰陶为主,泥质陶纹饰多为戳印纹、划纹,夹砂陶几乎都有绳纹,主要器类为绳纹花边口罐、敞口圈足尊、盘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和宽沿平底尊等。第二期泥质陶数量下降,但仍多于夹砂陶,泥质陶以灰黄陶为主,夹砂陶褐陶增加,素面增多,泥质陶纹饰主要为划纹,夹砂陶纹饰仍为绳纹,器类与第一期相似,新出现深腹平底罐。第三期泥质陶数量进一步下降,但仍多于夹砂陶,泥质陶以橙衣灰陶和黑衣陶为主,夹砂陶褐陶增加,泥质陶纹饰主要为平行线纹,夹砂陶纹饰主要为绳纹和平行线纹,器类与第二期相似,新出现窄沿罐、曲沿罐和窄沿盆等。第四期夹砂陶多于泥质陶,泥质陶以灰陶、灰黄陶、黑皮陶为主,夹砂陶以夹砂褐陶为主,纹饰比例下降,泥质陶绝大多数为素面,夹砂陶以绳纹为主,绳纹花边口罐、敞口圈足尊、盘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底尊、壶很难见到,新出现矮领圆肩罐、敛口瓮、敛口罐、折腹钵等。

宝墩文化第四期与前三期相比,陶器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如夹砂陶多于泥质陶,纹饰不发达,前三期遗存中常见的镂空圈足器、喇叭口高领罐等很少见到,而开始出现常见于三星堆文化的敛口瓮、绳纹小平底罐、绳纹深腹罐、绳纹侈口罐、绳纹釜形罐、瓦棱纹器盖、高柄豆等。因此有学者将它划分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称之为“鱼凫村文化”^②或“三星堆二期——鱼凫村文化”^③。

宝墩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内容:^④(1)聚落方面,遗址分布密集,有多座大型城址,城址选址一般与台地、河流的走向平行,平面主要呈长方形、方形和不规则多边形,城墙多采用斜坡堆筑法,有的城墙为双层城垣,城垣附近多见城壕。(2)房址方面,多为竹(木)骨泥墙建筑,兼有少量干栏式建筑,并出现可能具有礼仪性质的大型房址。(3)墓葬方面,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式绝大多数为仰身直肢葬,均无葬具和随葬品。(4)出土陶器方面,以夹砂褐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制法主要为手制加慢轮修整,纹饰以绳纹居多,器类以平底器和圈足器为主,不见三足器和圜底器,常见绳纹花边口罐、敞口圈足尊、盘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壶、宽沿平底尊、宽沿盆。(5)出土石器方面,以磨制石器为主,大多通体磨光,偏小型化,以斧、斨、凿为最多,另有少量的刀、铲、镞、矛等器物。

^① 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成都考古研究》(一),第63—87页。

^② 李明斌:《再论温江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的性质》,《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

^③ 雷雨:《浅析三星堆遗址“新二期”文化遗存——兼谈“鱼凫村文化”》,《四川文物》2021年第1期。

^④ 罗二虎、李映福主编:《中国西南考古——新石器时代至西汉》,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02—108页。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把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渊源关系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从年代关系来看,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上下衔接。根据各遗址已有测年数据和周边遗址遗存分析,宝墩文化的绝对年代可能为距今4500—3700年。^①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大致在二里头文化第三期至殷墟第二期,即绝对年代在距今3700—3200年左右。这在地层学上也能得到证明,在鱼凫村遗址、三星堆遗址中,都发现三星堆文化堆积叠压在宝墩文化堆积之上。

第二,从文化分布范围来看,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大体一致。宝墩文化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中心地域也在成都平原。但随着文化的发展,三星堆文化的分布范围要比宝墩文化有所扩大,尤其是在盆东峡江地区,原中坝文化的分布区在这一时期被三星堆文化渝东类型所占据。^②

第三,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陶器面貌呈现出一个渐变的趋势,宝墩文化的典型因素日趋消失,三星堆文化的典型因素逐渐孕育、形成和发展。从宝墩文化第一期开始,陶器中的泥质陶逐渐减少,夹砂陶逐渐增多;泥质灰白陶减少,灰黄陶增多;夹砂灰陶减少,褐陶增多;纹饰逐渐减少,素面陶比例增加;典型器绳纹花边口罐、敞口圈足尊、盘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底尊等逐渐减少。至宝墩文化第四期(即鱼凫村文化时期),夹砂陶比例超过泥质陶,上述典型器类基本消失,新出现小平底罐、敛口瓮、敛口罐、折腹钵等三星堆文化的典型因素。至三星堆文化第一期,夹砂陶比例继续增大,器类除了沿袭宝墩文化第四期,新出现侈口深腹盆、花边鼓腹瓮、浅平盘高柄豆、短颈长腹瓶等。至三星堆文化第二期,三星堆文化的典型因素除了觚形杯外全都出现了。

第四,宝墩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在三星堆文化中长期延续。房屋建筑方面,三星堆城墙延续宝墩文化城墙的斜坡堆筑法,有多层城垣,城垣附近有城壕,城内有大型红烧土建筑;房址多为基槽式竹(木)骨泥墙建筑,兼有少量干栏式建筑。生产工具方面,三星堆文化同宝墩文化一样偏重于斧、锛、凿等石器,且具有小型化特点。生活用器方面,三星堆文化中的典型陶器小平底罐、深腹罐、小圈钮器盖、镂孔圈足豆等均能在宝墩文化中找到原型。

因此,说三星堆文化的主体来源于宝墩文化,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显然可以看到,三星堆文化的面貌与宝墩文化还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三星堆文化具有代表性的青铜造像群、玉石礼器群、金器制作工艺不见于宝墩文化。除了期间的文化缺环尚待弥补之外,例如所谓“鱼凫村文化”的年代、分期、文化分布范围、基本特征、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等基本问题还尚不十分清楚,这样的文化面貌差异还在于三星堆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借鉴、融合了周边地区文化因素。

在三星堆文化形成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因素来自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出土的青铜牌饰、铜铃、玉牙璋、陶袋足盃、陶觚形杯、陶高柄豆等,在二里头文化中都有类似的器物,且最早不早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③三星堆文化崛起的时候,正值

^① 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成都考古研究》(一),第63—87页。

^②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忠县中坝》,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93页。

^③ 孙华:《试论三星堆文化》,《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第155页。

二里头文化的尾声。两者相同的文化因素在二里头文化中出现更早,三星堆文化明显是吸收、接纳了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尤其是青铜器和玉器,造型复杂、技术要求高,同类器物很难在不同地区独立产生。三星堆文化发现的玉圭、玉戚、玉璧、铜尊、铜罍、铜甗、铜盘、铜“将军盔”(熔铜的坩埚)等器物,也与中原地区二里冈文化至殷墟早期的商文化有很大相似性,可以看出后者对前者的影响。

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文化之间的广泛联系,很可能是通过长江中游传递的。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青铜容器,无论从器型还是从纹饰上看,都与长江中下游青铜器风格更为接近。一号坑出土的龙虎尊与1957年在安徽阜南月儿河捞起的龙虎尊相似,三星堆龙虎尊铸造得更为粗糙,一般认为是模仿安徽龙虎尊同类器物所作。^①在湖北江陵八姑台、四川巫山大昌、湖南华容、湖北枣阳新店等地均发现有与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风格特征十分相近的铜尊,而湖北沙市和湖南岳阳则出土有与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风格一致的铜罍。此外,三星堆文化的部分陶器、人(神)面图案、城址规划设计理念和墙体建筑技术等,也受到来自长江中游的石家庄文化和后石家庄文化的影响。

三 三星堆文化的去向

关于三星堆文化的发展去向问题,学者们的讨论集中在它与十二桥文化的关系上。1985年,成都十二桥街新一村在基建施工中挖出陶片和木构件等遗物,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随即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②1993年,孙华先生在讨论三星堆遗址的分期时,将广泛分布于成都市区故郫江两岸、以十二桥遗址为代表的这类遗存命名为“十二桥文化”,年代从殷墟第三期至春秋前期,^③并最早将十二桥文化分为三期六段,^④而后江章华先生等则分为两期四段。^⑤目前关于十二桥文化的年代与分期问题,焦点在于金沙遗址郎家村地点文化遗存的年代和考古学文化归属,即到底是应该归入三星堆文化,^⑥还是应该归入十二桥文化。^⑦

尽管还有不同意见,但学术界对十二桥文化的分布范围、文化特征已经取得了基本的

① 江章华:《三星堆系青铜容器产地问题》,《四川文物》2006年第6期。

②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十二桥》,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5—7页。

③ 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第49—67页。

④ 孙华:《成都十二桥遗址群分期初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23—144页。

⑤ 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⑥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郎家村“精品房”地点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04)》,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76—216页;冉宏林:《郎家村遗存再分析——兼谈三星堆文化在成都平原的分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6期。

⑦ 江章华:《金沙遗址的初步分析》,《文物》2010年第2期;马兰:《金沙遗址郎家村“精品房”地点文化遗存初步研究》,《四川文物》2011年第3期;于孟洲、夏微:《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变迁的相关问题——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谈起》,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65—184页;于孟洲、吴超明:《十二桥文化早期遗存初论》,《考古学报》2019年第2期;周丽:《试论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过渡期遗存》,《考古学集刊》第22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88—101页。

认识。十二桥文化已经发掘的遗址有十二桥、金沙、抚琴小区、方池街、指挥街、岷山饭店、羊子山土台下堆积、新都水观音、彭州竹瓦街窖藏等,文化遗存分布于从四川盆地到渝东峡江地区的弧形条状地带,中心区域在成都平原,北界至汉中盆地和关中西部的宝鸡地区,东至湖北宜昌一带。^①

十二桥文化尚未发现城址,房址主要为带基槽的木骨泥墙式建筑,有大型房址,也有中小型房址,以十二桥遗址发现的干栏式建筑最为重要。^② 墓葬均为中小型,以西北—东南向为主,多为仰身直肢葬,有少量二次葬,极少见葬具,随葬品不多。陶器以夹砂陶为主,素面占绝大多数,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有高柄豆、小平底罐、尖底杯、尖底罐、尖底盏、壶、瓶、盆、高领罐、波浪花边口罐、绳纹罐等。石质工具以磨制的小型斧、镑、凿和不知用途的盘状器为主。另有数量较多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骨牙器、漆器、卜甲等,主要出土于金沙遗址的“梅苑”地点,^③被认为与祭祀活动有关,是十二桥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遗物。青铜器有人像、人头像、面具、眼形器、动物形器、戈形器、璧形器、方孔器、锥形器等。金器有面具、条形饰、鱼形饰、蛙形饰、圆形饰等。玉器有圭、剑、钺、矛、刀、斧、凿、镑、磨石、璋、琮、璧形器等。石器有矛、圭、璧形器,还有很多人像、动物造型的器物。

通过以上叙述,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渊源关系,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年代关系来看,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上下衔接。尽管学界对介于二者之间的“过渡期遗存”还有不同意见,但主要限于文化归属的分歧,无论归入三星堆文化还是十二桥文化,它们从年代关系上都是前后衔接的。这在地层学上也能得到证明,在1984年发掘的三星堆遗址西泉坎地点中,第3层为三星堆文化三期堆积,第2层为十二桥文化一期堆积。^④

第二,从文化分布范围来看,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大体一致,均分布于四川盆地,并以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为核心分布区。但十二桥文化遗存在北至汉中盆地和关中西部的宝鸡地区都有发现,大大突破了三星堆文化分布的北界,表明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和扩张。

第三,从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陶器面貌呈现出一个渐变的趋势。在三星堆文化四期,三星堆文化的典型因素正在日趋消失,如夹砂褐陶的数量减少,夹砂灰陶的数量增多,泥质陶的比例有所回升;一些器物,如敛口深腹罐、敞口深腹罐、喇叭口罐、圈足盘、平底盘等基本绝迹;同时新出现有假腹豆等。而在十二桥文化早期,还残留有许多三星堆文化因素,如小平底罐、高柄豆、壶、瓶、盃等都是三星堆文化的典型器物。

第四,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之间存在许多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因素,三星堆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在十二桥文化中长期延续,列表如下:

① 罗二虎、李映福主编:《中国西南考古——新石器时代至西汉》,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33—238页。

②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十二桥》,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③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I区“梅苑”地点发掘一期简报》,《文物》2004年第4期。

④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南方民族考古》第2辑,第213—231页。

表一 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相同文化因素列表

类别		相同文化因素及文化特征
礼仪用品	铜器	均见有铜人像、瑗、有领璧、璋,且造型、纹饰具有传承性;均兼用铸造和捶打工艺。
	金器	均见有金面具、条形饰、鱼形饰、圆形饰;见有相似的羽箭鸟纹;均有捶打、篆刻、彩绘工艺。
	玉器	均见有玉圭、璋、琮、有领璧、璧形器、剑、矛、刀、斧、铤、凹刃凿等,且造型大多具有传承性。
	象牙	均出土较多象牙,多见整根象牙集中埋藏的情况。
生产工具	石器以斧、铤、凿为主,具有小型化特点。	
生活器具	陶器均以夹砂陶为主,素面陶占绝大多数,纹饰以绳纹为主;有同类器形如小平底罐、鸟头把勺、高柄豆、豆形器、尖底盏、尖底杯等。	
建筑形制	房址多为带基槽的木骨泥墙式建筑、干栏式建筑。	
生业方式	稻作农业为主,渔猎经济占有较大比重。	
社会模式	神权与王权并存,神权占有相当影响力。	
宗教信仰	盛行祖先崇拜、太阳崇拜。	
社会习俗	大小型建筑和墓葬多西北—东南向(东北—西南向);无厚葬习俗。	

因此,说十二桥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主要去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相对于同宝墩文化的关系,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关系更为密切,“流”似乎比“源”更为清晰。正由于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具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特征,而这些特征又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存在明显差异,学者普遍认为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同一考古学文化体系下的两支亚文化。1997年,李伯谦先生在论述三星堆文化时将之划分为四期七段,实际上已经把十二桥文化包括在三星堆文化之内了。^① 施劲松先生最近又提出了“三星堆—金沙文化”的命名。^② 但两者究竟是同一考古学文化,还是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实际上涉及考古学的理论问题,即界定考古学文化的标准问题。

孙华先生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器物群(尤其是陶器群)风格的变化作为遗址变化的主要参考指征,更不能简单地以陶器群的分期作为遗址的分期。一个遗址的发展演变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陶器只是这个聚落的人们日常使用的器物,完全有可能出现相同陶器群仍然在继续使用,但聚落的社会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现象。^③ 从这个角度来看,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变迁,与中心聚落的转移联系在一起。在三星堆文化末期,随着器物坑的掩埋和城墙的废弃,三星堆文化逐渐被十二桥文化所替代,当时的权力中心可能从三星

^① 李伯谦:《对三星堆文化若干问题的认识》,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三),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84—94页。

^② 施劲松:《论三星堆—金沙文化》,《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5期。

^③ 孙华:《三星堆遗址的初步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15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31—170页。

堆遗址转移到了金沙遗址。具体的时间,冉宏林先生认为很有可能在“新四期”1段偏晚时期,也就是殷墟二期偏晚阶段。^①雷雨先生则研究指出,三星堆古城和金沙遗址并存过一段时间,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共同构成了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重要阶段。^②

四 结语

早在1987年,苏秉琦先生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座谈会”上就曾指出,巴蜀文化自成体系,从距今5000年到3000年上下连贯,代表了四川地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社会发展阶段。^③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工作,我们已经对三星堆文化的基本特征、来源、去向有了初步的认识。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地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周边地区文化因素,并加以融合、改造而形成的复合型文化。在三星堆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土著文化因素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深具区域特色,构成了中国青铜文明体系的重要一环。随着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一定会不断刷新我们的认识。

作者简介:许丹阳(1995—),男,河南洛阳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三星堆遗址考古,参与三星堆祭祀区的发掘。

① 冉宏林:《三星堆城址废弃年代再考》,《四川文物》2021年第1期。

② 雷雨:《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发掘与研究》,王春法主编:《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菁华》,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年。

③ 苏秉琦:《西南地区考古——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座谈会”上的讲话》,《苏秉琦文集》(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16—117页。